

明朝水师的建立及其战船实力分析

高志发

摘要: 明朝水师在明中后期实力十分强劲,各个水师之间相互配合,达到了一种和平稳定的局面。文章通过介绍明朝水师前期水寨的建立、中期水寨的衰败与重建以及后期游兵制度的建立,对明朝水师的作战实力进行了详细研究。

关键词: 明朝水师;作战实力;海防

明朝水师的发展主要是应对当时我国海防事业的需要,而其形式,是驻扎在海域附近的水寨和游兵,构成了海防的主要防线。明朝建立水师,经历了前期、中期、后期不同的发展阶段。随着时间的迁移,海防政策逐步松弛,而我国初始防线也逐步内迁,让倭寇产生了可乘之机,直到戚继光两次入闽,才解决了外患的问题。在战争之后明朝逐步总结经验,提出了重建海洋水师的政策,对于水师的编制也逐步变得规范,由原来的拨兵派遣向岗哨过渡,改变了原有的分散现状,建立了现有的体制,也加强了水师的训练,提高了将士的身体素质,增强了我国水师队伍在海上应急作战的能力,加强了我国海防事业,也解除了海洋危机。

一、明朝水师建立的重要意义

明朝水师的筹备起源于明朝海上权益的维护,明朝时期倭寇一直是威胁明朝东南地区防卫的主要因素。出于对边疆地区疆土守卫的考虑,明朝建立了水师,主要

以福建水师为代表。福建水师在最初的发展形式并不叫水师,而是水寨。水寨的居民会设立会哨,在不同管辖区域之间进行,由南到北来进行管理和交流。水寨之间会相互联系、相互合作,以共同抵御同一方向和部队的敌人侵略。五个水寨之间相互联络和防御,形成一股合力抵御侵略,完成了自身的海洋防御任务,也作为防线对保障海洋事业的相对和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明朝前期的水寨主要编制比较简单,随着明朝的海洋政策而不断进行调整,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。

提起明朝的对外斗争,最先想到的就是抗倭。嘉靖年间倭寇肆虐,给人们带来深重灾难,加上常有水患发生,人们苦不堪言,赋税收入大幅减少,终于引起统治者关注,开始重视我国海防事业的发展。在戚继光将军平定倭寇之后,朝廷开始重整水师,在原来水寨的基础上加大补贴力度,在制度上进行优化,恢复原来水寨的机制,并纳入水师编制之中。但是相对之前的制度来说也有所改变,加入了岗哨制度。在官员周围设四名哨兵,设立官船,



官员坐镇船上统领部队，轮流出海。这极大地弥补了之前水寨后撤所产生的疆域缺少问题，五大水寨的编制也大多如此，并且朝廷规定了每个水寨的各种船型的规模，不同的规模有不同的船型配置，在船型配置方面有严格的审核机制。嘉靖年间恢复了五大水寨的制度之后，水寨之间的关系预测划分得更为明确和严格，管辖范围上有了具体的介绍，主要是以港口为连接线由南到北进行现地的划分，并且明确了各个岗哨之间的巡逻数量和巡逻节点。对于不同节点的巡逻是非常必要的，能够及时发现航海的情况和一些突发性的危机，并且水寨的责任也更加明确，在哪个节点受到突袭，没有进行紧急的应急措施，朝廷就会追究其水寨的责任。明朝中后期我国水师开始脱离了人与船相分离的模式，这也有利于水师之间加强沟通合作，增强官兵身体素质，提高在海上的战斗能力和应急作战准备能力。

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水师在明朝军队分布中的重要性。明朝的著名将领中，因为抗倭斗争被封侯或者留名青史的大有人在。他们在抗倭斗争中的功绩也说明了明朝水师的实力，毕竟明朝是一个农耕社会，面对的是当时机动性很强的沿海倭寇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还能够大胜，足以说明水师的实力。

明朝对于游兵制度的建立，是在水寨制度建立之后。原来的水寨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，随着统治者发展经济的需求，水寨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，于是就产生了游兵，游兵主要是和水寨之间相互配合，在海洋上作战，这就使疆域扩大到了海洋范围，而不再局限于沿海。明朝建立的游兵制度规模较小，局限于沿海地区，并且人数较水寨来说相对较少，只有几百人，并且船只的数量一般不超过 30。同时游兵的编制也比较简单，设立的时间大多在万历年间，设立长官多为水寨的领导，对于不同船只也有不同的人员分配。游兵主要起

到辅佐的作用，没有自身的管辖区域。一般情况下，在汛期会有外敌入侵，这时游兵就会在关键的节点增设把手，也是由于管辖范围的界限明确，游兵不能私自越界。但是对于有兵驻守的节点，设立许多关卡。游兵可以与水寨官兵相互配合，起到联动的作用，形成有效的合力，形成较强的防御能力。游兵和水寨之间相互合作，相互联系，互为补充，起到了保护我国海洋安全的重要作用。

二、明朝水师的战船实力分析

我国沿海地区，特别是福建，具有悠久的造船历史和浓厚的海洋文化。在一些史料上记载，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沿海地区的造船业就已经十分发达，战船击败了其他国家。明朝的造船业在宋元两朝发展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新，主要是加大了对于造船业的投入规模，也是为了防止倭寇的侵害以及满足海洋防护的需要，国家非常重视造船业的发展，在郑和下西洋期间，造船业更是达到了顶峰时期，并且明朝的水师造船种类繁多，有许多关于战船的记载，有专门应对海上作战的战船，包括渔船、蜈蚣船。在这里要重点介绍的是福船，福船主要是由于在福建建造而得名，并且有不同编码的种类和符号，福船的种类繁多，一般福船多指 1 号和 2 号福船。福船的尾端高竖，并且旁边设甲板竖立横杆，以保持漂亮的姿态，整体福船有 3 层，第 2 层主要是用于住人。福船最大的优点就是视野开阔并且便于航海，正是由于福船有这样的优点，它成为明朝水师装备中的主要战船，在作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，尤其是在明朝戚继光抗倭时期，其作用更是不可估量。福船主要便于外海作战，把敌人集中在外海区域进行消灭。但是福船也有自身的局限性，比如福船不能回溯，也不能靠岸停船，并且福船并不是由人力驱动，如果没有风来作为驱动力的话，也不能行驶，机动性不好，在出入港口时福船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。

虽然我国明清史上对福船的记载比较简单,但足以说明福船是追击敌人和运作材料不可缺少的战船。另外,明朝中后期的几种船型都是我国明朝水师在作战时常用的,比如6号福船的船型比较适合打探敌情。每种船型都有自己的利弊,也是根据当时作战的需要而定,有的体型高大,比较适合攻击敌人或者向远处眺望,有的比较适合巡逻,比如一些体型小的船。每一种船型在作战时期都体现了它们相应的作用,并且能相互配合,在运作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我国明朝造船业的造船实力非常雄厚,特别是福建造船业,造船的历史十分悠久。明朝在宋朝和元朝造船业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,加大政策支持,造船业的水平和技术有所提高,在世界上都居于前列,并且领先其他国家几百年。明朝初年的海防建设,促进了战船和造船业的发展,也提高了海军整体的水平。在明朝水师的海洋活动中,福建的造船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,并且在郑和下西洋时达到世界造船业的顶尖水平,明朝水师装备中除了有造船还有火药武器等,致使整体的战斗实力大幅度提高。在后来的戚继光抗倭战争中,对于火药的需求也逐步增加,给火药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也是我国古代社会四大文明发展的重要契机。并且明朝初年的军队供给也相对较高,这对于提高军队的整体战斗力,为军队进行后备储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在冷兵器时代,火药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整体战斗力的提高,也使我国明朝水师力量在世界居于领先水平。

明朝末期,清朝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推翻了明朝的政权,但是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平息复明势力和解散一些抵抗群体,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明朝在后期水师实力虽然有所下降,但是依旧有很强的实力,便于打持久战。在明末清初时期,清军入福建,福建的统领虽然已经逃跑,但是水师依旧没有改变阵地,仍有一部分武装水师进行反清的斗争。在东南沿海的局部地区郑成功举起反抗清朝的大旗,这时的明朝水师已经积累了海洋战争的经验,并且熟悉在海上作战的一些方法,清朝的水师并不能与之抗衡,明朝水师在当时的实力进一步提高,并且吸引了一大部分群体来进行反清斗争,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与清朝建立的军队相互抵抗制约。两股势力之间的实力牵制,也成为清朝后期发展自身水师的经验。清朝建立之后,在不断修复收编明朝水师的基础之上,建立起自己的军队。

综上,明朝水师实力强劲,是为了应对海洋危机而建立起来的,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封建统治,驻扎在海岛,成为海防的第一道防线,他们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宁、人

民幸福的作用,在水师重建之后更体现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在明朝中后期抗击侵略中,明朝水师确实发挥了其维护海洋国土的作用,在鸦片战争中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。同时明朝水师在驻防海岛开发资源、促进海洋贸易繁荣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纵观我国明朝水师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,明朝水师的兴衰都受朝廷海防政策的影响。在封建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海防思想,有着自身的局限性,这种局限性也影响了水师的发展壮大。明朝水师在驻防时,既担负了保护海洋的责任,又对海洋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。应该认识到,由于统治者愚昧腐朽的政策,我国清朝后期海洋水师事业后退,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,也为后代留下了关于领土争端的历史问题。我国在现今发展海洋事业的同时,一定要注意建立海洋事业的制度性保障,还有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。(作者单位系临沂大学)

参考文献

- [1] 徐晓望.论明万历二年福建水师的台湾新港之战[J].福建论坛(人文社会科学版),2019(11):109-115.
- [2] 曾磊.明末辽东的龙武水军研究[J].北华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7,18(3):55-58.
- [3] 孙卫国.明抗倭援朝水师统帅陈璘与露梁海战[J].南开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20(4):161-172.
- [4] 张岩鑫.晚清海战岸防图解析及其军事败因探讨[D].长春:吉林大学,2019.
- [5] 谢必震.郑和下西洋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[J].福建理论学习,2015(2):26-27.
- [6] 石宏云.明清广东方志中的沿海地图研究[D].南京:南京大学,2015.
- [7] 邢浩.福建地区海防军事聚落布局研究[D].天津:天津大学,2019.
- [8] 谭玉华.明朝海防战船欧化变革的历史考察[J].中山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9,59(5):128-139.
- [9] 杨星星.论晚清旅顺海防要塞的经营与防御作战[D].石家庄:河北师范大学,2019.
- [10] 杜晓伟.明清时期海防同知研究[D].昆明:云南大学,2019.
- [11] 于君涵.明代广东海防军事聚落体系研究[D].天津:天津大学,2019.
- [12] 吴小玲,何良俊.明清时期北部湾海防及其对海外贸易的影响[J].广西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2016,38(6):134-141.
- [13] 李广超.郑芝龙海洋活动研究(1621—1635)[D].厦门:厦门大学,2018.
- [14] 赵志刚,林一宏,滕春霞.中国古代海洋安全意识管窥[J].军事历史,2019(3):82-87.
- [15] 涂小棋.清代北部湾地区海防研究[D].南宁:广西民族大学,2019.
- [16] 陈辰立.明清大东海渔业社会与海洋权力的博弈[D].厦门:厦门大学,2019.